

# 历史变迁中的民间文化记忆

——读中国重庆土家族作家吴加敏长篇小说《花灯》

[中国]张羽华\*

## 目 录

- 一、花灯：历史记忆的时间刻度
- 二、花灯：土家人的民间情感纽带
- 三、花灯：演绎土家人的生命轨迹
- 四、花灯：印证土家人的情爱历史
- 五、结语

## 引 言

中国重庆的吴加敏是土生土长并长期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作家。他凭借对文学的挚爱，对生活的敏锐感悟，在充分汲取民间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利用现代西方艺术技巧，创作了一系列地反映武陵山区土家族人民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出版了长篇小说《时光度尽》、《记住一条河》，短篇小说集《鸭子塘之夏》等作品。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界，他看淡身边一切荣誉的光环，始终执迷地域文学创作，衷心于孤独地沉浸在武陵山区优美的山村角落思考人类生命的哲学。他以民间画家的手笔为一群生活在武陵山区土家族人民的人物画像，充分把土家族人与生活积淀的民间文化、民族精神很好地熔铸在一起，从民间文化的内涵中审视土家族人的生存命运、情感流向。这不仅体现在吴加敏的早期创作中，也体现在近作长篇小说《花灯》对历史记忆的叙述格调中。

\* 土家族，长江师范学院文新学院讲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在读博士。

这部小说称得上一部严格的家族小说，它叙述的是20世纪后80年严家几代人与花灯生死别离的故事。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了历史的光影，情感的伤痛，生命的顽强抵抗力，但作者的叙述还不满足于此，凭着深厚的本土体验和文化素养，他在对民间文化资源整合中透视出一种审美艺术的光辉，呈现出土家族严家几代人对花灯的挚爱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哲思，由此给我们带来无尽的艺术感染和审美享受。

## 一、花灯：历史记忆的时间刻度

在武陵山寨，花灯是历史记忆的时间刻度。花灯是土家族人民千百年来所从事的一项民间文化艺术，集歌、舞、乐于一体，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意蕴。作为一种民族仪式，它在土家族人民的生存生活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始终体现着土家族人民的生活观念和生存价值。作者一直生活在民间，感受民间带来的文化气息，以花灯作为书写的主题，寻找一种自我追求人生价值的独特途径，从中感受生活的快乐与自由，从而“更好地恪守了自身独特的精神品格和审美风范”。<sup>1)</sup> 作者把花灯贯穿于几代人的生活流程中，再现了本族人民对民间文化的挚爱和讴歌。同时，把这一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元素移植到文学艺术世界里作为审美原则和叙述标准来阐释民族性格，并运用理性的思维激活沉淀在千多年来民族心灵中的魂灵，在逐渐衰败的历史文化中想象民间文化的可塑性，以此涤除我们深受现代都市气味浸染心灵的杂质，重新咀嚼沉浸在乡村角落的精神食粮，从而获得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享受。作家拾取花灯的民间传说，熟识花灯的发展进程及动态，凸显花灯在土家族人心目中的价值，这本身不仅具有文学艺术的审美意义，还更体现出了人类学、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

吴加敏在题记中写道“爱也花灯，恨也花灯，乐也花灯，苦也花灯”，体现了作家对花灯的挚爱。同时，作为文学的写作佐料，他能很好的把花灯这一民

1) 洪治纲，《无边的迁徙》，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间文化元素熔铸到文学艺术的精心营造中，以此见证花灯的发展衍变历程。由花灯的爱恨乐苦看出土家族人民在经历时代变迁中带来的生存困难和生活愉悦，继而窥视花灯这一民间文化渗透到作家笔下后的审美艺术世界。城市的繁杂和乡村的宁静所形成的紧张对立关系在新世纪的舞台上逐渐得到缓和，但是这种拉关系的家常是以牺牲乡村文化为基础来促成“乡村城镇化”为代价的。抵抗乡村的遗忘，拯救乡村的文化记忆，成为这一时期作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记忆在形成人类对自己的认知和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取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sup>2)</sup> 记忆像一缕阳光，在土家族作家吴加敏心中难以抹去。记忆促使他书写本民族的历史使命，尽管花灯在作家的叙事中是以文化的代码出现，但是这一文化符号却深深地表征了土家人民的精神指向。作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存在方式，花灯是以公共广场作为平台通过集体的演艺来展示给观众的一种文化艺术形态，以近距离的日常生活审美活动再现土家人生存方式的一种艺术行为模式。这种文化意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了土家族人的文化习俗、民间信仰、生存方式和精神境界。选作特定的节日来表演花灯，正体现了土家人对时令的敏感。因为跳过花灯以后，意味着农时到来，生命力的复苏。祛除灾难，家和万事兴，渴望来年大吉大利是土家族人生活的根本追求。集体记忆的呈现方式是通过个体记忆来显示，个体记忆以集体的形式来凸显，但在历史的长河中，集体记忆最终是以个体记忆的方式承载下来，文学记住的是作家个体的经验和记忆。在对历史的诠释过程中，作家的个体记忆付诸于文学中，其主体思想倾向通过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花灯》是以作家个体的记忆方式来还原消逝后的集体演绎的真实场面。

《花灯》是一部书写民间历史文化记忆的小说。吴加敏以现代文明的眼光来审视花灯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脉络，以武陵山区土家山寨生存的一个明确的地理坐标——白粉墙村作为叙述故事的空间，生动地描绘了一幅武陵山区人民美妙凄苦的生存图景。小说尽力展示了花灯的狂欢活动场域，而这种仪式活动

2) [德]扬·阿斯曼，《消解历史的秩序》，陈启能，王学典，姜芑主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一直持续千百年。作家以花灯为题名，这本身蕴涵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基质，同时在对小说的叙述中，很自然地揉进一些具有诗意的花灯词曲，不仅体现了个人记忆，而且融合了集体记忆，因为花灯词曲的说唱本身都具有大众记忆的属性。比如小说中写到跳花灯的热闹场面，集体情不自禁地演唱《观灯调》的强烈局面：“庄稼老二来看灯，转回家中办阳春，办得稻谷顺田倒，办得黄金遍地金。看牛娃儿来看灯，转回家中看养牲，看得牛来牛成对，看得马来马成群”<sup>3)</sup>，灯词中隐含了土家人民强烈的生存欲望，渴望来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同时，通过庄稼老二和看牛娃儿的视角来抒发花灯的强劲局面，在于着力展示农村强力的生命力和精神世界，凸显了土家族人民的爱情、民间信仰、价值观念、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另外，演唱花灯词调不止局限于特定节日的活动场面，在劳动间歇时间，也会无意识地演唱灯词，消除劳动带来的精神疲劳，当然也体现了年轻人朴素而又简单的生活理想。严茂章和杨旺财下柳州做大米生意在路上就演唱起花灯词调：“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柳州，人说柳州姑娘好，个个姑娘会梳头。大姐梳个盘龙卷，二姐梳个插花纽。只有三姐梳得巧，梳个狮滚绣球”，“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柳州。柳州爱我白米好，我爱柳州好丫头。有钱的哥哥讨过去，我们无钱泪双流，眼泪流在石板上，石头开花嫩悠悠”，<sup>4)</sup>这正是两位土家年轻人对未来爱情生活的真实写照。吴加敏以小说创作的形式来加强对花灯民间艺术文化的传播，营造一种浓厚的民间文化诗学，为保存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花灯词调作为一种民间历史文化记忆的时间刻度，永远存活在土家人的心中，不断丰富他们人生的意义。

3) 吴加敏，《花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4) 吴加敏，《花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42页。

## 二、花灯：土家人的民间情感纽带

花灯是土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由于深受现代文明的浸淫，传统乡村民间文化的宁静被打破，民俗文化固有的精神色调逐渐褪掉。针对这不幸的局面，只有具有本民族生活体验的作家才能够真正挽救花灯即将消逝的命运，在精神价值上复现花灯的第二次生命。在某种程度上，作家把花灯作为白粉墙村生命繁殖的象征，把花灯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民族神灵来敬仰，很大的因素在于花灯维系着白粉墙村的生与死、兴与衰的局面。在闭塞的白粉墙村，在饥饿的年代，是花灯鼓舞了他们生存下来的勇气，进而使他们把花灯看着生命的至上美学。因为任何一种民间形态下存在的象征性符号显现出的文化气象都具有一定的精神命脉和人文镜像，文化的气息、文化的韵味乃至文化延续的生命力都掺杂着一股人浸入的血液和地气催生的生命力。

更为重要的是，吴加敏不仅从行文气势上声张花灯的活动场面，把偏僻的白粉墙村建造成世外桃源，还从审美艺术上丰富花灯文化内涵，从而激活了民间的情感元素。在作家的叙述中，白粉墙村严家几代人为了繁荣花灯，除了农活劳作以外，都把主要经历集中在花灯的文化营造上。小说在开篇呈现期盼花灯来临的心态，“又要到跳花灯的日子了。又有一段宣泄情感、有酒有肉有人敬重的生活等待着白粉墙”。渴望又要跳花灯的急切心态不仅是每年春节白粉墙春必须的礼节，而且也彰显着白粉墙村人对花灯的喜爱和艺术追求。当然，劳作了一年白粉墙村的村民，可以把一年的酸甜苦辣在跳花灯的喜庆中发泄、冲霄掉，同时还赢得邻村人的敬重。对花灯的现场展示，不仅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符号形象的着力张扬，也是对一个人身份地位的呈现。在传统乡村世俗社会，土家族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往往从民间手艺的高低来衡量，比如吹拉弹唱，土家姑娘的针织纺弹等。花灯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象征，在白粉墙村人看来更是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正如作家在小说中代言，“花灯伴随着白粉墙村千百年的日子，也给白粉墙村带来了窄窄的欢乐。虽然不宽阔，但很真实，也联系着山里人的生存命脉”。作为具有传统延续的花灯家族，严家的血脉沾着花灯的

魂，严家生是花灯的人，死是花灯的鬼。严家跳花灯跳出一种超越世俗的境界，能够在表演的艺术中涤除人间的疾苦，带给人们吉祥的人生。正因为严家的花灯技艺高超，才得以引起周边村落的注意并受到敬仰。他们每到一个村寨跳花灯，都会迎来啧啧的赞叹声，同时还会得到土家人酒肉的热情款待。

花灯给白粉墙村土家族带来了强劲的凝聚力。他们在狂热的民族文化表演中，更加表露出世代勤劳持家、精明劳作的良好品格。在时间的流逝中，土家人始终把花灯奉为至上的文化仪式来崇敬。特别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白粉墙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一种被战争压抑和摧残数年的苦难日子已经被抹除，继而代之的是被花灯带来的自由和幸福。在人生与死的较量中，白粉墙村的人也为花灯的传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就在他们试图获取新生活的同时，山区的土匪夺走了花灯传承者杨旺财的生命。在战匪混乱的场景，杨旺财完全可以保住自己的生命而弃花灯不顾，然而，由于出于对花灯的挚爱，也是对花灯尊严的维护，杨旺财抱着丢失后捡回的花灯，在土匪的乱枪下，遭受射击而怀抱着被水浸染透的灯笼死去。这对热爱花灯的父親杨家勤和妻子白金花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在挽救花灯不受践踏的行为举止上，杨旺财得到白粉墙村人一致的尊敬和赞扬。

严斯草在极左运动的压力中，一如既往地关注花灯的发展。花灯始终维系着白粉墙村人之间的情感。当好友杨家勤的儿子杨旺财因保护花灯被打死后，严家极力照顾杨家，后来因为大饥饿波及到白粉墙村，没有劳力的杨家陷入饥饿的状态。而严斯草为了拯救杨家爷孙，敢冒风险去社里拿粮食，结果遭到暗算，在反右的冲击下，被斗争和毒打，后来不堪忍受屈辱而上吊自杀，这不仅是花灯历史命运的挫折，也是时代带给白粉墙村人的灾难，同时在逆境中更能够体现出村民质朴的生存观念和为人的善良本质。在“文革”中，女儿严小寒也为了传承花灯，付出一定代价，毅然走上演艺花灯的道路，成为传播花灯的使者。后来严小寒的女儿唐吉接过母亲的接力棒，继续从事花灯研究。他们为白粉墙村和严家的花灯技艺播撒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

### 三、花灯：演绎土家人的生存轨迹

花灯的历史演绎印证着土家族人民的生存轨迹。作者把叙述的时间定格在20世纪后80年，是一个颇费心思的选择。通过20世纪后80年来对花灯的传承人严添东以及一家五代追踪描述，以花灯的命运揭示严家几代人的生存命运，通过时代的命运展示花灯的命运，最终把花灯与土家族人的生存命运有机熔铸在一起，标示着土家人一种独到的文化生存策略。体验是一种过去了的充分存在，而且也是一种叙述的可靠资源。作家运足了丰富的写作能量，展现出武陵山区一幅生动的民间生存艺术图。20世纪不断发生的政治运动波及乡村角落，作者在政治的边缘处感受到了政治充斥着生命气息，在雅克·朗西埃看来，政治不是权力的实施，而是一种行动中的特殊行为模式，是一种主体性存在和社会象征性结构，“政治的本质工作就是对其自身的空间进行构型，就是使得其主体和其运作的世界得以呈现”<sup>5)</sup>，恰恰相反，在政治的构型中，权力作为隐性的存在触及到了武陵山区边民的生存状态，打乱了他们静态的生存方式，也波及到了作家在政治边缘状态下的文学体验书写。吴加敏在日常生活的体验中感受到了花灯的艺术魅力，从而在感悟民族文化的气息中书写这段不平凡的土家人的生存历史。把土家族的民间祭祀、民间故事、民间活动、民间风俗、民间理念以及精神气象等民俗文化全部容纳到作者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中，这是我们在品读小说中感受到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土家族的历史文化演变过程就是它的一部社会历史发展史。小说以时间顺序来阐释白粉墙村严家几代人的生存命运，分为十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是又不脱离整部小说的结构。作者在每部分匠心独运地设置冬天作为讲述故事的时间起点，这里明显具有历史的隐喻意义。冬天象征着民族节日的来临，而举行花灯的仪式在冬天来临不久的日子里进行。冬天也寓意着花灯不平凡的经历。冬天，对于土家族山寨人来说，意味着寒冷和饥饿，特别是大饥荒几年，更是给土家族人民带来了

5) [法]雅克·朗西埃，《政治的边缘》，姜宇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30页。

历史性的灾难。然而，白粉墙村人在花灯的精神鼓励下，度过了无数次苦难，最终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春天。

没有与过去的关系，就不会看到土家族民间文化的今天，更不会有我们将来民族给予的希望。没有这段苦难的民族历史生存经历，就不会有今天我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追忆，作为作家，更不可能把记忆诉诸于小说之中来编织故事，从而渗透出丰富的文化意蕴。无始无终的时间具有不可捉摸的方向性，人生的生命轨迹注定在时间的轨道上向前自由滑行。人生的时间是不可逆转的悄然流逝。时间的定义无可把握，但时间对于人的命运具有难以衡量的权威性。吴加敏无权去掌控时间的自然运行，但是他有权把消逝的历史时间固定在特定的时段，通过历史在时间的滑行中留下的痕迹来印证时间留给白粉墙村的生命及存在的意义。对于土家山寨白粉墙村的人民来说，时间就是一种唠叨的日常生活。吴加敏把这种遗留在时间中的日常生活打捞起来，激活它的生命元素，注定是对时间流的生活叙事的艺术化呈现。

历史是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经验之上。历史把偶然的系列事件按照逻辑时间顺序进行叙述，并从此获得了意义。1919年的冬天，带给了白粉墙村财富和希望，在围绕着花灯的舞蹈下，他们跨到1939年冬天，历史的苦难正在奔向闭塞的山村，日本的屠刀和枪弹正在无情地朝武陵山寨袭来。尽管如此，历史的生命照样延续，白粉墙村的花灯照样坚挺它的艺术生命力。《黄杨扁担》的歌声以强劲的气势在山间飞扬。时间是一种政治意识。时间是一种权威性的资源分配。1949年的冬天，武陵山区传来了历史性变化的风声，花灯在长期压抑下迎了解放，但是在土改运动的挤压下，白粉墙村演艺的花灯再次受到排压。直到1958年“反右”运动，白粉墙村人也难逃脱厄运。到1961年冬天，饥饿席卷全国时，深处武陵山区的白粉墙村又遭受毁灭性打击。饥饿击倒了白粉墙村人的身体，但是没有击倒他们对花灯的惦记，没有摧垮他们的民族精神。在填饱肚子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跳花灯，展示花灯的民间艺术魅力。白粉墙村的花灯不仅在周边造成影响，而且在县剧团李团长的引导下，也在全县传播、推广后产生轰动效应。



在1968年冬天，当全国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时，白粉墙村才开始了它必须经历的历史故事。作为严家的第四代严斯草，在风云激荡的运动面前，仍然坚守在花灯演艺的舞台上。在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时刻，花灯屡被禁止演出，这对把花灯视为生命的白粉墙村人来说，更加让人伤感和愤怒，甚至是一种屈辱。随着运动的升级，严小寒们只有在小范围内私下给子孙辈传授花灯技艺。在政治斗争使得众多人遗忘时间的同时，他们并没有忘记花灯表演，那种粗暴干涉文化的威力并没有扫除土家人对花灯的民间记忆。就像严小寒教育孩子唐吉，别人的孩子可以不去当演员学跳花灯，但是作为严家的后代必须承续这一祖传文化，否则就对不住白粉墙村，对不住严家祖宗。当政治运动接近尾声时，作为严家的后代，严小寒感受到冬天白粉墙村的单调和凄凉，没有往年过春节的热闹迹象，她深感村民与花灯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在堆满积雪的寒风中情不自禁地含泪唱出了花灯词曲，“冬月望郎小雪花，冷气逼人烧炭元，别人烧火有人考，小妹烧火也枉然。腊月望郎整一年，小妹上街买春联，场头去到场尾去，忽见哥哥在眼前。”<sup>6)</sup> 而受到感染的女儿也参合到歌唱中来：“骂声哥哥你太玄，小妹望你一整年。情哥不是东流水，为何一去不会还？”<sup>7)</sup> 出于作者对民间文化真切的感受，把严家爱好花灯的灵魂摸透，从而在述说中不自觉地呈现出民间文化带来的艺术感染力。

历史意识有时会从精神或思想上勾勒消逝的风景，力挽民间文化的精神危机。1978年的冬天，尽管花灯还没有引起当地政府的足够重视，但是从民间的迹象来看已经有所涌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花灯已迈过历史的沧桑，在“文革”十年的摧残下，尽管花灯在逐渐萎缩，但对于严小寒辈来说，仍然烂熟于心。春节间，严家在白粉墙村进行了一次启灯仪式，正是恢复花灯在民间的传播，承受几十年压抑的花灯又给白粉墙村带来了生命活力。1988年冬天，在文化凋敝的武陵山区，振兴民族民间艺术，特别是与世代相伴的花灯已引起各部门重视。政府的引导和民间的踊跃参与，使花灯再次出现繁荣的机会。严家的

6) 吴加敏，《花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第268页。

7) 吴加敏，《花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7页，第268页。

后代唐诗渝对民间艺术十分爱好爱好，他整理了岳父的花灯词曲，以尊重历史为基础，丰富了剧本《黄杨扁担》的思想内容，从而向人们展示花灯与人民唇齿相依的情感经历，也从中品味出花灯带给人们的快乐与忧伤。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改革的春风中，历史终将以正义的姿态，审视民间文化的历史变迁，把花灯正式向省城推广，展现民间艺术的审美内涵。尽管在1999年冬天，花灯的传承艺人正在遭受物质利益的冲击，然而，具有生命力的土家族花灯正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迎接着春天的到来，花灯的历史文化功能正在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定位，也使得他们更好的认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花灯的命运如此，土家山寨人的命运更如是。

作者通过80年的时间跨度不厌其烦地叙述花灯在白粉墙村、在县文化局遭受的经历、传承中遇到的挫折以及引起严家命运的跌宕起伏，目的在于告诉我们花灯作为民间文化的艺术张力，它与民族构成千百年来的历史情感，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摧残，只要土家族人民能够秉持土家族历史民间文化的正确态度，保持正义的折磨，记住过去的历史生活，花灯总会得以承续下来。尽管这种文化记忆充满着民间历史的投影，但是它留下了武陵山区土家族人的生命印迹，它为挫伤过往的土家族人提供某种文化狂欢的补偿。作家也正是透过历史流动的花灯这一民间文化来传达武陵山区土家族人命运的沉浮与国家历史的兴衰，通过古朴的花灯词曲、民间的习俗信仰，民间的精神气质巧妙地与历史运动事件交织在一起，真实地反映少数民族山区变迁的历史风貌，展示了历史前进中的不平凡的经历，揭示了土家人民生活的精神状态和精神气象。

#### 四、花灯：印证土家人的情爱历史

土家族的花灯印证着土家人的情爱史。在《花灯》的讲述中，作者修正了沈从文《边城》中翠翠的纯真、质朴、虚幻、悲情的乌托邦情爱世界。吴加敏把边城民间的情爱的真实、自然而毫无保留地叙述出来，在历史的生活体验中

建造一座白粉墙村花灯的艺术王国。他始终在讲述一件真实而又有价值的东西，在津津乐道中追忆一份遗产，在叙述和创作形式上把花灯的历史演变与白粉墙村严家几代人的情爱故事交织在一起。花灯充满巨大的情感诱惑力，因花灯而爱恋，因为花灯而使相聚千里的恋人走在一起。花灯的历史就是人的情爱史。婚恋组成了家庭，在家庭的延续中，通过家庭的合法性记忆窥视出花灯的历史发展进程，呈现花灯的演示现场，因为“家庭的记忆不是基于它的故事清单的完整性，而是基于回忆实践的完整性和重复性，还基于对一部规范的家庭史的杜撰”。<sup>8)</sup> 在故事的讲述中，严家几代人都是因为对花灯的挚爱而催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促成了家庭事业，进而推动了民间艺术的发展。春节期间，白粉墙村到邻村枫香坪跳花灯，严茂章的高超花灯技艺吸引了前来观瞻的陈家姑娘陈彩莲。在媒婆的牵引下，按照土家族的风俗习惯，最终使一对恋人走在一起。这对苦苦追随严茂章的白金花来说，无疑产生难以言说的悲苦恋情，后在严茂章的示意下，白金花和严茂章的灯友杨旺财喜结连理，但是这又为后来杨旺财因为把花灯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而被土匪的乱枪打死，给白金花带来更加的苦痛留下了隐患，使得白金花寡妇难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改嫁贵州。在严茂章看到儿子严斯草的花灯技艺达到一定水平后，他毅然把花灯传给了儿子，让他挑起了白粉墙村花灯班的大梁，成为方圆百里闻名的民间花灯艺人，这就使得严茂章把主要精力放在下柳州做大米买卖上，但是，当白粉墙村一行唱着花灯词调下柳州时，这为严斯草千里之爱恋埋下了伏笔。

封闭的村落共同体运用同一原则来规约村人与外人的交往，封闭的空间阻塞了白粉墙村人的思维和行为，但以严茂章为首的具有“新思维”的行动走向却与远方拉近了空间的距离，被阻隔的日常生活空间界限被打破。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空间观念的爱情模式在严茂章的行动滑行下，突破了白粉墙村传统的婚姻模式，凭借严斯草的心智和才艺，获得了白粉墙村第一个跨越地域的完美爱情婚姻。奠基情感的基础是，亨通米店的老板作为严茂章长期生意往来值得信

8)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李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页。

赖的伙伴，在他带着儿子到这里来的时候，严斯草暗恋上了老板的爱女覃柳叶，被覃柳叶美丽的身段和涵养所吸引，而严斯草的英俊和壮实也被覃柳叶所迷惑，后二人互倾爱慕，一见钟情。当严茂章一行要返回白粉墙村时，严斯草借口做学徒留在了亨通米店，最后两人在互爱之中产生了鱼水之欢。但是随着冬天的来临，作为白粉墙村花灯的掌门人，他承担着严家花灯的传递者这样的角色，不得不考虑到祖传的义务和责任，同时这也是自己对花灯的民族认同。在花灯和情感之间，严斯草产生了难以入眠的痛苦，不过花灯的情感压住了与覃柳叶的情感。在难以诉说的情况下，在花灯的感染下，作为覃老板的爱女不顾门第观念最后与严斯草私奔，跑回白粉墙村，共同铸造家庭和事业。

严家的爱情故事并没有到此中断。在白粉墙村，严斯草和覃柳叶养育了一对儿女严小寒和严小东，子女都对花灯有一种天然的热爱，在解放后县剧团的李团长到白粉墙村视察工作中，发现了严小寒的艺术天赋，顺利进入了县剧团，成为公家人。这也为二人的爱恋提供了条件，因艺术而爱，但是“反右”运动悄然而至，李团长被打成“右派”而不知所终，最后严小寒与爱好民间艺术的唐诗渝走在一起，他们为了花灯的繁荣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最具有戏剧性的是，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和磨难，花灯的艺术生命也焕然一新，出现了走向外地的机会。一个偶然的巧合，已改名的李博陪同文艺考察团来到了县剧团，使严小寒早已沉淀的恋情之花重新燃起。之前，李博在经受极左运动的磨难后，失去了心爱的恋人，十几年后再次相遇，那种隐没在心中的爱与痛只有通过互相埋怨的场面显示出来：

李博颤抖着说：“小寒！”严小寒“哇”地一声痛哭起来。李博同样也泪流满面。李博让严小寒进屋，把门关上。严小寒猛地扑进了李博的怀里。严小寒一边用手擂李博的肩膀一边哭诉：“李博，你……好狠心，抛下我，四十年……不管，也不给……一点音讯，四十年，你……好狠心啊！”李博同样泣不成声，说：“小寒，不是我……狠心，是世道……不平！我……”<sup>9)</sup>

9) 吴加敏，《花灯》，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61页。

最后在激烈的情感搅动中，李博突然猝死在舞台边，这对艺术恋人终因时代的阻扰最后见一面而画上了句号。作为严添东的第五代，唐吉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花灯技艺的责任，但是在偶然的巧合中，她与一个生意人周锋爱恋而结婚，这显然违背了严家的初衷，与不是志同道合的人组合在一起，注定了婚姻破裂。最终与爱好民间技艺的舞伴陈天歌结合在一起。他们在生长花灯的的土地上继续向民间艺术迈进。

## 五、结语

写作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尽量接近生活经验，感受生活体验，即在写作中不是完全的自我映射，与自身有一段距离，但又与自身生活贴近。作家在故事的叙述中把笔墨的重心放在花灯的历史演变中，把严家几代人的情爱故事贯穿进去形成一种表象世界，这成为吴加敏民间历史表达的支配性媒介，使得民间文化和严家几代人的情爱故事自然地交融在一起，发生一种结构性的关联，在生活体验的意识和民间历史文化的洞察之中，更能渗透出花灯作为武陵山区的一种民族艺术文化所体现出来的艺术生命力。“如果故事在叙述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联系中应当具有或者创造‘意义’，那么这些故事必须成为叙述者与受众共有问题的答案”，<sup>10)</sup> 这或许是我们寻找武陵山区花灯与人的历史意义思考的新途径，更是作者寻找历史“意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

10) [德]约恩·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綦甲福，来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50—51页。

### 参考文献：

- [1] 涂鸿《中国当代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建构》，中国·台湾秀威资讯科技公司出版，2012.
- [2] 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 [3] 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4] 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5] 安纳·杰弗森等著《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概述和比较》，陈昭全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 [6] 马学良、梁庭望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7] 弗莱著《批评的解剖》，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 [8] 茨维坦·托多罗夫选编《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9] 赵毅衡选编《“新批评”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10] 卡西尔著《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11] 中国作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中国作家网，2004.
- [12] 徐曙玉、边国恩《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 [13] 程光炜《中国当代诗歌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14]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Abstract>

Folk Cultural Memories in Historical Changes  
— China Chongqing Tujia writer Wu jian novel “Lantern”

Zhang, yuhua

The novel *A Lantern* not only excavated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Tujia folk, written the survival fate and love story of the Yan family for generations at the teasing age. Wu Jiamin's soul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folk cultural memory, he feels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explores good wishes of the human, chase life surging spirit trajectory and thus insights into the fate of the roots in the folk o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Key words : *A Lantern*, Cultural Memories, Tujia, Love Stories

투 고 일 : 2013. 05. 12. / 심 사 일 : 2013. 06. 01. ~ 2013. 06. 17. / 게재확정일 : 2013. 06. 23.